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
【孟县卷】

总主编：李玉明
主编：李晶明

田雨公传略

田常 著

田雨公（1808—1876），字敬堂，又字砚农，号杏轩。清嘉庆十三年八月初十出生于山西省孟县香河村。村前有一条流经县城境内呈南北方向的河流，相传春秋末年仇犹国君凿道迎钟，不曾想晋国智伯随之以兵，仇犹国君战败而亡，仇犹国君的香妃纵身跃入此河，身死国灭，而遗泽香远……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三晋出版社

目 录

序.....	1
第一章 进士之路	2
第二章 仕宦生涯.....	7
第三章 小臣荐举与大王宸断.....	13
第四章 同治轶事.....	19
第五章 执教里中.....	22
尾声.....	24
附录:	25

序

父翰林 子翰林 父子翰林叔同科 侄同科 叔侄同科

上面一副对联是指清代孟县香河村一户田姓人家。父亲指的是田雨公，儿子是田国俊，两人都是清代翰林。而叔叔指的是田雨公胞弟田雨时、田雨人，二人与侄子田国俊同时中举。时人称一门人才之盛，而尤以田雨公为著。

本书主人公田雨公（1808—1876），字敬堂，又字砚农，号杏轩。清嘉庆十三年八月初十出生于山西省孟县香河村。村前有一条流经县城境内呈南北方向的河流，相传春秋末年仇犹国君凿道迎钟，不曾想晋国智伯随之以兵，仇犹国君战败而亡，仇犹国君的香妃纵身跃入此河，身死国灭，而遗泽香远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刚烈女子，故起名为香河。远古时，可能也是汪洋恣肆，汹涌滔滔，只是随着沧海桑田，河山带砺，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裸露的河床足以说明当时的洪水之大。此地先民傍水而居，故名香河村，俗称乾（gan）河。这条蜿蜒灵动的河流亘古不息，养育了河两岸世代辛苦劳作的人们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稍有富贍，便读书致学，跻身士林。他们胸怀天下，进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亲历践行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治世理念。在历史过往中曾出现学而优，优而仕，仕而有名者如明之史文焕，清之武全文、王珪、武承谟、张在田、田兴梅、田嵩年、田国俊、刘声骏、李崢龄等令后人景仰的先贤人物，田雨公便是众多佼佼者之一。

第一章 进士之路

香河田氏明洪武年由陕西米脂迁移于此。史书记载元末明初，战乱频仍，生灵涂炭，米脂当时饿殍遍野，析骨而炊，易子而食，十户不居其一，人们只好离乡背井，四处求生。田氏远祖名奉家，亦属逃难之列。一日行经此地，见山水俱佳、民风淳朴、土地饶广，便择居而处，肇基于此。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，艰苦耕作，到田宿这代人终于有了改观，家境渐渐有所好转，粮食也有了富余。因出粟赈灾，被旌为尚义良民；其子田崇良，也因出粟赈灾，被旌为尚义千户。俗话说，仓廩实而后知礼义，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经济上的充裕，使父子二人有能力开始延聘塾师，教子孙读书。天遂人愿，终于有了第一代邑庠生即秀才田鏞，算是第一个穿长袍的读书人。然而仅仅博得一个秀才名衔，只能算是有识阶级的最底层。而田鏞的儿子田有井是这个家族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，他大约生活在明万历年间，县志记载他为一贡生，做过一任小官——省祭官，相当于现在地方上的监察官员。但他却是才品兼优，长于决讼。公务之余，闲暇之时，常常与子弟讲经论道。言语间常常慨叹道：“吾家读书久不效，后世子孙当努力为学，方不坠吾家风”。又言：昔齐田氏五世而昌九世而王，安知我香河田氏无有一二人物，光前裕后，济世安民。于是约定家规，诫子孙以圣贤为法。此后香河田氏允忠允孝，耕读传家，渐至清中期而成为邑望族。子弟中有读书致仕，入幕做官的；也有威望日隆，学养醇厚的耆宾、介宾、大宾；有在别处当训导教谕的，有开馆授徒，声布四方的饱学之士；也有坐镇京津、贸易淮扬、经商辽东的富商大贾和商界精英。然而人才泛泛，却没有一个正途出身。中举人、考进士、点翰林是多少人多少代梦寐以求之事，只有这匹千里马——田雨公的出现，才改变了这种局面，也让这个家族大放光彩，至今村中父老乡亲都以此为荣，一谈到田雨公便有说不完的话题，怎样会读书，怎样会断案，文官如何下轿、武官如何下马等等，坊间种种的传闻，听来令人啧啧称叹。现在香河村后人为了感念先贤田雨公和他的儿子田国俊（咸丰九年的进士，后入翰林院，做到贵州按察使）懿德风貌，特尊称本村为翰林故里。既是怀念曾有的辉煌过去，同时也是对后辈的一种无言激励。

当谈到某个人时，往往要谈到他的祖父、父亲。追根溯源，盖童稚之时，受祖父、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，潜移默化，自是养成一种禀性习气。心性的浸染也决定了其成人后的认识观和世界观。田雨公的祖父田士蔚、父亲田生蕙无疑对他影响是至深的。

田士蔚字豹文，太学生，生于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，享年六十有七。他是这个家族中很有威望的一个人。少小读书常能见文中大意而又多与先贤暗合。后因生计困顿，遂放弃读书转而去安徽、扬州等地做茶盐生意。平常在家的時候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弟兄，治家认真严肃，从没有一点迁就敷衍，也不俯仰于世，立心坦白，遇事

敢言；与人相处又介而有容；古道热肠，常常急公好义。他教育子弟又常常以祖训为法，“至今经学文章科名日盛皆公之教也”。后来，田雨公通籍翰林后，为其祖父勒刻墓表，以彰扬他的恩泽深长。墓表由当时的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贾桢撰写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寿阳祁隽藻书丹。墓表中特别提到咸丰五年一家叔、侄（田雨时、田雨人、田国俊）同时考中举人，成为当时街头热议。二人不得不感叹道：“公之遗泽孔长，公固有以知之矣，岂待三槐之植而后可卜哉”，对此敬慕不已。

田雨公的父亲田生蕙字崑圃，道光、咸丰年间研习性理之学，被时人目为大儒，尝讲“儒业宜师法程朱，以诚意正心为务，圣贤之道惟躬行而有得焉”。这与同时期的理学大师倭仁所主张的理学观念有惊人的一致。倭仁被时人称为“孔孟程朱之真传”，是“程朱之正脉”。倭仁理学思想的特色是躬行践履，主张排斥王（阳明）学，纯正道统。无疑田生蕙是道咸时期程朱理学的服膺者和布道者。

俗语谓非常人必有非常之事。田生蕙少时便与众不同，“自幼不喜与群儿嬉”，常常一个人手书口诵，几乎到发痴的程度，人过其身，竟不之觉。一日读书错过了吃饭时间，索性继续读下去，其父质问，他回答道：“儿读书充饥，不觉饿”。长大后又刻苦励学，“绝征逐之交”。当许多年轻人沉迷于声色犬马间，他却三更灯火五更鸣，废寝忘食地读书自娱。然而文章憎命达，每次试则优等的好学生，却在乡试中屡屡受挫，使人不由得想到“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功五读书”，这条读书人无法回避的魔咒，只得在道光庚寅年由学使考贡成均，被推荐为国学生。

乡试的失败，使他不再留恋依靠科举求取功名，转而开馆授徒。然而这一干竟达五十年之久。执教期间，生蕙悉心训迪，“虽一饭之顷而口讲指画不少辍”，学生中捷南宫、登仕版者不可枚举。这之中就有他的三个儿子：雨公、雨时、雨人和他的孙子国俊、朝俊、邦俊，还有本县的举人吴树人、南娄张景星、进士石寅恭、还有少年名士石寅衷，生蕙特意把田雨公之女许配与他。而当他的两个儿子田雨时、田雨人和孙子田国俊同时中举，却“悚然畏惧于天道之恶盈”，不汲汲于功名至此立见。

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总是急人所急，想人所想。当别人处在艰难险危之中，总是挺身而出，义无反顾地帮助，而后又不求回报，这样的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与爱戴。时孟县姓康的县令，解职以后，在太原病逝，妻子、儿子均先他而去，只有一个小孙子才刚刚几岁，还需别人照顾。生蕙主动操持此事，慷慨解囊并号召同人捐款，助其亲人扶柩携孙回到故土。本县一位诸生在北京授徒讲学，暴病而亡，将要被人葬在义园，生蕙写信告知在京做官的儿子雨公，让他资助其灵柩返乡，不使其客死他乡，岁岁少了亲人祭祀。有一人逾墙进来偷盗，被佃户和家人抓住，意欲送官治罪，田生蕙知道后，就说：“这个人平素不是此种人，必是不得已才行此下策。”问之，原来其家几天都无米下锅，家中妻儿老小实在饥饿难耐，被逼无奈，想窃些麦子回家，不料被发现。生蕙听后，不假思索道：“救人如是救己”，遂取家中余麦送与他，嘱咐其好生做人，不能行此苟且事。

孟县县令听到田生蕙的人品和学识后，特聘为秀水书院讲席。县令“倡举节孝”，田生蕙命儿孙辈力为赞襄，先后采访得节妇五百余人，孝子四人，次第请旌建牌坊以彰潜德。

田生蕙德行道艺久为一县所矜式，道光甲辰年被举为乡饮大宾，同治元年诏举孝廉方正，“官绅咸以应其选”。

田士蔚、田生蕙父子二人学养深厚，品行卓著。田雨公身受其教，浸润恩泽，更是加重砥砺修养。所以说经过几代人的沉淀，到田雨公时厚积薄发，困极而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雨公小的时候特别聪明，五岁开蒙，父亲教其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朱子格言》。雨公过目成诵，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下来，这让他的父亲欣喜不已。俗话说，三岁看小，七岁看老，这孩子天性聪颖，身无旁骛，看来是可造就之材。小的时候，生蕙经常给雨公讲那些直言敢谏，不畏权势，为民请命的历史人物，雨公听后，对他父亲讲：“大丈夫本该如此，儿应向这些先辈们学习”。后来，雨公在他父亲的教授下学习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经》及诸子百家。从后来的诗文当中看出他特别喜欢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《文选》，终身成为案头之物。稍长即研习制艺（八股文）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十八岁那年院试，“成为邑庠第一名”，被时人“目为国器”（光绪县志）。当然少不了个人的寒窗苦读，焚膏继晷，以及父师的严格督导。

有时在想，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一种人，好像天生就是为着读书而来。从最初的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直至上大学，一直都是名列前茅，春风得意。虽然也不乏方仲永之流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但是造化弄人，偏偏就有传说中的这种人。

田雨公少年聪隽、性质温美、学问优长，渐渐为当时士大夫所赏识。时任山西学政杜受田磨勘留档试卷时，更是推崇备至，激赏不已，“洵佳士也”。道光十五（1835）年，雨公来到省城太原应举人考试。这一年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邓瀛，字介槎，福建上杭人，善于制艺。

这一次乡试考题为：“盍徵招角，是也”，语出《孟子》梁惠王；其次做诗，题目为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得‘秋’字”五言八韵。其实闻道有先后，却是术业有专攻。一个人的文学才华不仅在于学富五车、淹通古今，而在于会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。当年苏轼作“刑赏忠厚论”内引用尧帝一典，欧阳修盛赞苏轼其文本自天成，并说“此子文章将独步天下”。所谓锦绣文章，非但言语华丽、气象万千，而且浑然天成，不见雕琢之痕。考卷交上去后，被定为亚魁，也就是举人第二名，这无疑是对田雨公学识的极大肯定。之后，田雨公拜访了老师邓瀛（清朝有一规定，这一科是谁负责主考的，学生都要执弟子礼），邓瀛大赞其才，并延为自己的座上宾。并嘱咐他要百尺竿头，更上一层楼。田雨公又向老师请教了学习制艺的方法、要领。老师毕竟是过来人，遂将多年来的考试心法一一讲与雨公听。最后老师要求多研习明人制艺及定期进行练习，并与雨公相约在京城见面，雨公拜谢而去。这一次的考试成功跟老师的提携栽培有关，更提振了雨公信心和勇气，等待他的将是三年以后的会试考试。

闲云潭影，物换星移。

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马上就迎来戊戌年也就是道光十八（1838）年的会试考试。

一日，田雨公在父亲和族中长老的带领下，来到田氏祠堂，祭拜历代先人。他是香河田氏族人中第一位举人，这给他们带来无上的荣耀和会心的满足。盼望这一天的到来，已是十几代人，世世代代的期盼，终于可以如愿以偿，告慰历代先祖在天之灵。封建社会下的这种家天下教育，只有读书出仕，才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唯一出路。只有站在这个制度的上层才能治国安邦，才能为民请命，才能光宗耀祖，才能封妻荫子。毋庸置疑，这是封建时代每个家族梦寐以求的事情。虽然也有，财可敌国的富商巨贾，却常以无功名为憾，总要想办法捐一个红顶来充门面，以致晚清买官卖官成风，官场加速度地腐败，终致亡灭。后又选一吉利日子，带上果品糕点，香纸蜡台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来到祖坟地——东院坟地烧香祭祖，算是一种告别仪式。说到东院坟，村里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。

传说田雨公六世祖田大亨，一生行善积德，常常周济生活窘困人家，有大善人之称。一日救助一老者，老者深通堪舆之说，为了答谢田大亨，遂留下一句隐语——“村之南、河之西，旁可置百家，后有贵人出”，作为田大亨百年后的窀穸之地。据村里老人们回忆说，东面的山像一座太师椅，而对面山势平坦就像一个书桌。好像是有人坐着太师椅看书办案，只是在日本人侵略期间欲修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路，被人建议取道东院坟，才破坏了它的风水，至今遗迹仍在。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只能当做故事听。但无论如何，田雨公的出现算是应验了这个谶语。

初春二月，田雨公辞别父母兄弟，踏上了去京城的道路。出娘子关、经获鹿、过保定，这条几百年来，无数举子走过的路，现在就在田雨公的脚下。对这个刚过而立之年，将来位列九卿的中年人来说，当时心境又该是怎样的呢？

这一年的大总裁是大学士穆彰阿，兵部尚书朱士彦，礼部侍郎吴文镕，工部侍郎廖鸿荃。十八同考官内有季芝昌等人。田雨公自是不负众望，被录取为二甲四十五名，这在清代孟县的进士考试中，只有田嵩年一人稍居其于前（田嵩年为二甲第五名）。这应该是不错的成绩，首次出山，便马到成功，成为令人羡慕的联捷进士。所谓联捷是指，在中举之后，又连续考中进士，又叫两榜进士。古来多少读书人蹭蹬科场几十年，幸而得一举人，却又止步于进士面前，真是情何以堪。以致吴敬梓满腹孤愤，只好写小说来排遣。蒲松龄写鬼画狐，瓜棚豆架之下做起了隐士。他二人若不靠了这两本书，岂不也是汲汲无闻？后世人又怎能知道他们也是科举制度下的失意文人？所以说田雨公是很幸运的，要知道清代科举在取士过程中很多的随意性。比如：在光绪十三年考试中，翁同和就这样记述：“一等柏森（写作净），二等荣林（字好）海昆（字劣），三等世续（倒写一字）锡锐（空格未填）”，以字好坏来作评判的一部分。同一年考取进士的曾国藩就因为字写得不好，被定为三甲同进士，成了曾国藩一生引以为恨的憾事。清末的梁士诒本被选为一等第一名，就是因为是广东人，慈禧听信谣言，认为他与康祖诒、梁启超有关系，就把他降到第四名。现在看来科举选拔中应有偶然成分在里面的。但是个人实力却更是他们一举成名的法宝。清末著名大儒王闿运，论才学、灵气，那都是人中之凤。可就是在咸丰九年会试考试中，考试题目为“高车高棚”，本出自《史记》

循吏列传孙叔敖一节，可是他却误以为出自《孟子》，风马不相及，结局可想而知，科名更在孙山后。更可叹的是他的朋友，肃顺的心腹幕僚高心夔居然两次败在同一问题上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高心夔应会试，肃顺任收卷大臣，一心想把状元帽子给高心夔戴上。又怕有才华超过心夔的，便想了个办法，限定下午四时必须交卷，不料还不到四时便有一人交了上来。肃顺气得一把塞在朝靴筒内，直到回家脱靴才发现，不觉吓了一跳，急忙派快骑将试卷送到阅卷大臣处，阅卷大臣以为这个卷子肯定是头等重要的，乃作为第一名呈给皇上。高心夔也在前10名之列，及到殿试，肃顺还是暗中为心夔争状元。然而，鬼使神差，心夔在作命题律诗的时候，诗题限押“文”韵，而误入“元”韵，遂不与三甲之列。状元衔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。次年会试，肃顺再次轻身犯险为高心夔“助拳”。这年恩科会试，心夔入了二甲，参加殿试。肃顺神通广大，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“纱窗宿斗牛得门字”，出处为唐人孙逖的《夜宿云门寺》。立即把心夔叫来，嘱咐他连夜赶做。第二日入场，果然是这个题目，场中三百多人，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。心夔大喜，自命不作第二人想。匆匆写就，出来就找肃顺报喜。肃顺接过诗稿一看，顿足捶胸，大叫“完蛋！完蛋！”原来，高心夔记错了韵部，押韵的八个字除了“门”字外，都押到了“十一真”韵，而“门”字在韵部却属于“十三元”。考试出韵，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，榜下，心夔又列四等。同时落选的王闳运幸灾乐祸，送他一副对联：“平生双四等，该死十三元”。看来古代士子非得穿凿经史，熟读百家，搜罗百代，蕴藉宏博，或许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其他如龚定庵、张穆等，怀才不可谓不富，声名不可谓不响，但均铩羽而归，科场不能得意。可见在过去中个进士是多么难的一件事！

田雨公经过一系列复试、殿试、朝考，由道光皇帝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而这科也被称为得士最盛，原因是清代考试有响榜和哑榜之称（清代中举、中进士都要张榜公布）。同一年中有曾国藩、晏端书、钱振伦、毛鸿宾、田雨公、何桂珍、陈雨沛、宝鋆等人，有的成了封疆大吏，有的入主军机，所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响榜。

第二章 仕宦生涯

田雨公等人由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，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，定时授课，讲经授法，教给各种知识（包括写作知、制、诰等一些文书告示），来提高处理国家政务的能力。

按照惯例，田雨公等这一年的庶吉士应该到道光二十一年才散馆，因为二十一年（1841）是道光皇帝六十大寿，正科改成恩科。（按正常科举是三年一次。但是遇到朝廷庆典，特别开科考试，称“恩科”）。故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四月，进行散馆考试，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，授编修或检讨，正式成为翰林，称“留馆”。二甲进士授编修，三甲进士授检讨，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、御史，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的，田雨公以二等优异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。

翰林生活虽然清苦，但境况景遇立马有所改变，社会地位瞬间被拔得老高，号称清贵之选，能享受到很多特殊待遇。比如清代规定文官五品以上才能挂朝珠，四品以上才能穿貂褂。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官也可挂朝珠，穿貂褂，甚而还会充乡、会试考官，充各省学政。礼遇极隆，升迁很快。

自古翰林院就被作为官员的升转之地，国家的储才之所。一句话，国家安排干部时优先考虑的便是这些翰林士子们。

需要说明的是在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其嗣子田国俊出生。谁曾想到二十年后也考中了进士，点为翰林，做到布政使、按察使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八月，田雨公被安排到武英殿修书处做一名协修员，这应是田雨公授职后的第一个工作。

接下来在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充任武英殿总纂官，后又充任国史馆协修、文渊阁校理。

武英殿纂修是个差事，不算官。康熙年间，朝廷开武英殿书局。康熙十九年将武英殿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，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，由亲王大臣总理，监造、主事、笔帖式、总裁、总纂、纂修、协修等 30 余人，由皇帝从翰林院充派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以后，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，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，字体秀丽工整，绘图完善精美，书品甚高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命将《永乐大典》中摘出的珍本 138 种排字付印，御赐名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世称“殿本”。但是到清道光时，刊书已经很少，武英殿纂修仅存其名。国史馆在清代属于翰林院，掌修国史。根据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，国史馆设总裁若干，由皇帝特简。清文总校一人，满洲侍郎内特简。提调满汉各二人，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派充。总纂，满洲四人，蒙古二人，汉六人。纂修、协修，无定员。

这期间田雨公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。工作之余，和同年翰林们过着风檐展书、雨窗赓韵，诗酒唱和，雅相投契的生活。他们惺惺相惜，互相推重，彼此期许。有时相约到琉璃厂去淘书、品识；有时结伴到古寺名刹怀古抚今。今日某兄邀约，明日某兄赴宴，燕肆之间正是人生得意之时。而这些人中，曾国藩便是一位相交不错的朋友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应田雨公之请，曾国藩题诗于雨公所画兰草。

浅红生绡一尺半，描金兰叶光灿灿。不知谁氏书画船，遗作君家锦绣段。时弃时取了无凭，花若有情花亦叹。有客对此三沉吟，一夜魂飞洞庭深。故乡蘅杜知我心。

洛阳三月天如银，杨花浩浩愁煞人。美人璇阁弄鹦鹉，伤心不敢当青春。独对盆兰诉幽怨，再拜且为花写真。腕轻著花只嫌瘦，钏重放叶难为伸。帘外双双蛺蝶舞，羞汝自在好要身。搁笔下阶傍花立，临风三嗅馨香泣。

田郎田郎似我懒，反锁衡门走宾馆。三年啖蔗未曾甘，九畹艺兰行复满。不愿举国扬芬芳，但愿同心通悃款。晨书小楷眼欲花，午睡醒来日已斜。从容读书还煮茶。（《曾国藩文集》）
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田雨公、曾国藩相携出游，归后，田雨公录杜诗以应。

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》中的一首，其诗云：“不识南塘路，今知第五桥。名园依绿水，野竹上青霄。谷口旧相得，濠梁同见招。平生为幽兴，未惜马蹄遥。”
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十一月一日，曾国藩“至汇元堂拜田敬堂尊人寿，因在彼处应酬一日”，期间因多看了田雨公家眷两眼，甚感无礼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是曾国藩祖母七十六寿辰，“田雨公早早来到曾宅祝贺”，而曾国藩却因一时没有准备而变得局促不安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田生蕙来到北京。田雨公为其父举行了祝寿仪式。祝寿者有钱振伦、郭雨三、毛鸿宾、金国均、曾国藩、晏端书、何桂珍、祁宿藻等人，摆桌两席。席间曾国藩为其父写下了六十寿序。全文如下：

道光某年月，为我年伯昆圃先生六十初度。其嗣君敬堂同年，丐余以文为寿，且曰：“古者，称寿不必揽揆之辰；寿人以序，抑非古也。然震川归氏、望溪方氏尝为之，是或有道焉。”余曰：“然。寿序者犹昔之赠序云尔。赠言之义，粗者论事，精者明道，旌其所已能，而蘄其所未至。是故称人之善，而识小以遗巨，不明也；溢而饰之，不信也；述先德而过其实，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亲者也；为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，不忠也。今子所以寿亲者，于意云何？”敬堂曰：“吾父固好质言。凡生平庸行、众人所恒称道者，不足为君述。吾父早岁以课徒为业，迄今几四十年。尝曰：‘塾师鲁莽塞责，误人子弟不浅，吾不敢也。’戊戌，雨三幸成进士，选庶常。吾父书来，戒以初登仕版，勿轻干人。”于戏！安得此有道之言乎？盖自秦氏燔群籍，教泽荡然。汉武帝始立《五经》于学宫，使诸生各崇本师，置博士，举明经，而圣吉乃绝而复续。明太祖以制艺取士，并立程朱之义，使天下翕然尊尚，而圣贤之精蕴始照灼于幽明。二君者，盖见夫学校之不可复，故定为功令，使人以此为禄利之途，而阴以尊儒术而阐大义。由今言之，明圣遭于煨燼之余，而炳若日星，表宋儒之精理，使僻陋下士皆

得闻道者，不得不归功于二君。然使人以诗书为干泽之具，援饰经术而荡弃廉耻者，又未始非二君以启之也。今世之士，自束发受书，即以干禄为鹄，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。得矣，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。禄利无尽境，则干人无穷期。下以此求，上以此应。学者以此学，教者以此教，所从来久矣。百步之矢，视其所发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振古君子多途，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。小人亦多途，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。今先生之诫子，首在不轻干人，则平日之立教，所谓不误人子弟者，概可知矣！出处取与之间，士大夫或置焉不讲。而乡里老师耆儒，往往以教其家，绳共门徒。吾父课徒山中，亦有年所，每诫小子，辄曰：“俭约者不求人。”与先生辞旨略同。而吾党郭君雨三，亦得父训以成名。当交相毖勉，力求所以自立者，以图无忝所生。不然，先生不欲误人子弟，而吾辈一离膝下，乃反自误其身。日偃月玩，委弃而不克自振，终且不免于干人也。吾言不足以重先生，而犹不敢谀词欺吾友。是或为先生之所许乎？敢以为长者寿。（《曾国藩文集》）

序中透露出田生蕙训诫田雨公“勿轻干人”，这为田雨公一生为官做人定下了一个基调，以致“与官交无私面及笏牍片字”。立身刚正，风骨峻峭，清誉满朝，都得力于其父的教诲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三月六日，内阁发布道光皇帝上谕，要大考翰詹。清制，翰林院官员自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以下，编修、检讨以上；詹事府自少詹事以下，中允、赞善以上；每隔数年（一般是六年），不定期召集考试，不许称病托词，规避请假，称为大考。大考据考试成绩，最优者超等升擢，其次酌量升级或遇缺题奏，成绩一般的留任，最下的分别降调、罚俸、休致、革职。

田雨公同年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写的家信中，对这次考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：“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……三月初六日奉上谕，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孙初闻之心甚惊恐。盖久不作赋，字亦生疏。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，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，到今仅满四年，万不料有此一举。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！……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，初十日卯刻进场，酉正出场，题目另纸敬录，诗赋亦别誊出。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场者三人，病愈仍须补考。在殿上搜出夹带，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名如山（戊戌同年），其余皆整齐完场。十一日，皇上亲阅卷，十二日，钦派阅览室卷大臣七人，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。钦定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……十四日引见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记名候升者五人，赏缎者十九人（升官者不赏缎）……”（《曾国藩家书》）

大考是翰林最大的关口。忽然要大考，曾国藩用“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”来描述翰林公们的心情。而田雨公当然也在惶悚之列。考试中甚至还有人带小抄，一个叫如山的旗人翰林被抓住送交刑部治罪，是田雨公他们的同年，也是有名的书画家。而这次田雨公的考试成绩为二等十一名，为记名候升者五人之一。

谕内阁、此次考试翰詹各员。经阅卷大臣等校阅进呈。朕复详加披览，亲定等第。一等五员，二等五十五员，三等五十六员，四等七员。其考列一等之编修万青黎、殷寿彭，俱著

以侍讲学士升用；左庶子张芾，著以少詹事升用；左中允萧良城，著升授侍读；编修罗惇衍，著升授侍讲；二等之检讨曾国藩，著以侍讲升用；编修丁嘉葆，著升授侍读；编修郭沛霖、杨能格、方壘、吴敬羲，均著以赞善升用。以上各员，现在无缺可补者，俱著先换顶带，在任候缺。中允孙铭恩、检讨王东槐、编修徐士谷、金国均、田雨公，均著记名遇缺题奏。孙铭恩、王东槐、徐士谷、金国均、田雨公、何绍基、福济，著各赏大卷八比缎袍料一件，小卷江褂料二件。吕佺孙、李承霖、陈宝禾、梁国琮、黄琮、段大章、恽光宸、祁宿藻、赵振祚、蔡宗茂、汤云松、史淳，著各赏大卷袍料一件。该员等其各勤学砥行，以副朕培养人才至意。（《道光实录》）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又举行一次翰詹大考，这一次田雨公排二等十五名，还是著记名遇缺题奏。

谕内阁：此次考试翰詹各员，经阅卷大臣等校阅进呈，朕复详加披览，亲定第一等四员，二等五十四员，三等六十员，四等三员，不列等一员。其考列一等之编修王庆云、俞长赞俱著以侍讲学士升用；编修支清彦、潘曾莹俱著以庶子升用；二等之编修冯誉骥，著以侍读升用；侍读许乃钊，著以庶子升用；编修杨式谷，著以侍讲升用；编修宋晋，著以中允升用；编修王履谦、何若瑶，俱著以赞善升用；修撰龙启瑞，著以侍讲升用；编修徐玉丰，著以赞善升用；中允钮福保，著以侍读升用；以上各员，现在无缺可补者，俱著先换顶带，在任候缺。编修孙锵鸣、边浴礼、侍讲学士曾国藩、编修张炜、钱振伦、洗马田雨公、俱著记名遇缺题奏，并各赏大卷八丝缎袍料一匹，小卷八丝缎褂料二件。侍读学士新升詹事府詹事何裕承、著赏给大卷八丝缎袍料一匹。小卷八丝缎褂料二件。编修杨福祺、毛鸿宾、翁同书、陈庆松、廉师敏、何彤云、沈大謨、赞善胜保、编修孙鸣珂、侍读萧良城、编修梁敬事、史淳、张金镛、蒋琦淳、侍读富呢雅杭阿、编修刘昆、王景淳，俱著各赏大卷袍料一匹。该员等其各勤学砥行。以副朕培养人才至意。（《道光实录》）

两次翰詹大考，田雨公都名列前茅，其博学多才及在武英殿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，渐渐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，多次被钦点为同考官、副考官、正考官。

在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被选为甲辰会试同考官，总裁为穆彰阿。

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考试，同时还充任考试汉御使一职。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件，从这次事件当中，我们发现了田雨公刚正不阿的一面。

在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“王鼎尸谏案”。王鼎效仿古人史鱼自缢身亡，以死来劝谏道光皇帝。在给道光皇帝的遗折中指出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也”。这个穆指的是穆彰阿（穆当时权倾朝野，门生弟子遍布），林指林则徐。当时穆彰阿窥主游移，以“和”迎合道光皇帝。而尸谏案发生后，穆的羽党陈孚恩首先侦知此事，迅即告知穆，穆命与王鼎同乡的张芾、聂沅以威逼利诱的手段，从其子王沆的手中拿走遗折，另以他折上奏，致使王鼎死不瞑目。而事件中的聂沅因此备受穆的青睐，许以某年大考登魁。道光二十四年即甲辰科考，穆彰阿意欲聂沅为科考第一名，于是遍嘱其他

三总裁及十八同考官，并授以关节。而在十八同考官中就有田雨公。他虚以应酬，在第二天的考试中，发现有关节的试卷，他遂抽出试卷，锁入筐中。其他同考官没有发现聂的试卷，便到处找寻，最后在陕西考房中找到田雨公，他心知肚明，故意说道：“我昨夜不小心，有一试卷被蜡烛烧烬，莫非是诸君所要找的吗？我明天自会请求失职处分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默不作声，聂运遭了现世报。穆彰阿也只好作罢，对他的这个举学生也无可奈何（穆彰阿是田雨公的座师），此事自是不了了之。

其实当时的穆彰阿大权在握，朝野上下无不知晓，科道九卿的升迁多取决他本人的喜好。田雨公有此一事，足见其胆识和人品。我们不妨看一下清人李岳瑞写的《春冰室野乘》，记载穆是如何的大权在握，专横跋扈。

顺德罗椒生尚书惇衍，泾阳张文毅公（芾），云南何根云制府（桂清），三人同年登第，入翰林，年皆未弱冠。且同出汤海秋农部房，海秋为之狂喜，赋《三少年行》者也。时道光未造，穆鹤舫相国（彰阿）执政，炙手可热，张、何两公皆附之，独椒生尚书绝不与通。散馆后，初考试差，三人皆得。差命既下，尚书往谒潘文恭，文恭问见穆中堂否，曰：“未也”。文恭骇然曰：“子未见穆相，先来见我，殆矣。”尚书少年气盛，不信其说，亦不竟往。次日，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，未可胜衡文之任，著毋庸前往，另派某去。人皆知穆所为也，其权力回天如此。国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，尚书一人而已。实则张、何之年，皆小于罗也（考是年登科录罗十九，张十八，何十七）。（《春冰室野乘》）

同年八月，田雨公又被选为河南乡试副考官。一方面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历练，另一方面也是对田雨公知识和人品的肯定。清乾隆曾说过“各省正副考官，司鉴衡之任，必得学问优瞻，校阅精明，而品行端正，秉公持正直。”而清代翰林士子多以得学政、考官为荣。

这次乡试考试中河南籍的考生薛书常，就是田雨公慧眼识拔而举于乡的。后来薛书常不负师望，一跃龙门而高中进士。也充分验证了田雨公的识人之明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田雨公又被派往江西充当乡试主考官。曾国藩家书中也透露出“不意放田敬堂典试江西”。江西当时为富庶地，据说考官都愿意到经济条件好的地方，因为当地所赠比较丰厚，可补京官们左支右绌的经济来源。本来这次曾国藩志在必得，却不想被道光皇帝放了田雨公的考差，可见道光皇帝对田雨公的厚爱之情。

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又分别担任复试举人阅卷大臣、武殿试汉御使读卷大臣。

田雨公在任职内尽职尽责，渐渐被道光皇帝所认可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被任命为司经局洗马。司经局洗马虽然在六部九卿百官中无足轻重，却是掌管皇家图书的编写、印制，可直接上达天庭，多了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，工作当中也会受到道光皇帝的垂询，也较能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关于“洗马”一职闹出的笑话，近人朱德裳在其所著《三十年闻见录》一书中亦有记载。洗马一职，秦汉即有之，为东宫官属，太子出，则前驱导威仪。晋以后职掌图籍，隋曰司经局洗马，历代因之。明制，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，制典图书刊辑之事。立正本、副本、贮本以备进览。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，皆

受而藏之。并有校书、正字，掌缮写、装潢经史子集、制典图书，论其论谬，调其音切，以佐洗马。清废建储，仍留詹事府为翰林升转之地。司经局与春坊同裁。洗马暨庶子等并入詹事府。唯结衔仍署坊局字样而已。其洗字本读先，上声。而俗读久如洗涤之洗。于是清华之职，乃若躬司洗涤马匹者矣。明人关于洗马之记载，有可发噱者。如《病逸漫记》云：“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，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，戏曰：‘君职在洗马，所洗几何？’刘公应声曰：‘厩马皆已洗，独大司马洗不得也。’闻者为之绝倒。”耿向定《先进遗风》云：“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，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，与之坐而抗礼。座然间曰：‘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’公漫应曰：‘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，无定数也。’俄一御史且至，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。公曰：夫固宜然，待其至而让未晚也。”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。踞而起居。丞乃睨御史不见，蒲伏阶下，百状乞怜。公卒亦不较。两事均堪捧腹。洗马之贵，驿丞不知，乃就字面解释而轻之。（朱德裳《三十年闻见录》）

洗马一职虽然比较位微，但却是官员的升转之地。较为人熟知的杜受田、张之洞，也都是通过洗马一职作为晋升之阶的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被擢为鸿胪寺正卿，掌朝会议节等。说明了田雨公是一个善于统筹全局、事无巨细，而又深谙机括且执行力很强一个人，如果不这样，恐怕难当此任。这一年当中，国家每次举行的重大朝会及祭祀和安排接待四方藩务人员，均由田雨公主持操办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秋八月，田雨公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，兼领稽察右翼宗学。大理寺古称廷尉，负责审理讼狱。大理故主平反，然官此者多簿书期会、随例画诺，而田雨公独穷研详究，间于定案加纠驳，“时称允当”。

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田雨公的职位一年一迁或两年一迁，还多次参与了乡试、会试等考试，足见他的学识和能力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认可；而在公务之余，道光皇帝经常在便殿召见，向其问政。田雨公自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引经据典，历数各代治乱之由，为君之道、为臣之道，直陈当下漕运、盐务、吏治种种弊端；不避忌讳，颇有汲黯之风，为国家计、为苍生计，多不顾身。为此，道光皇帝多“嘉纳焉”。这种君臣之间的际会让田雨公踌躇满志，等待他的或将是大好前程。然而，正当宠誉日隆，皇恩浩荡之际，却随着道光皇帝的死去而变得前途未卜。

第三章 小臣夔谋与大王宸断

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正月，道光皇帝崩于圆明园。继任的是他的四儿子奕詝，年号咸丰。咸丰刚刚二十岁，这位生于深宫之内，养于妇人之手，用一句“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，以干天和”，侥幸赚得皇位，却冥冥之中注定清朝亡于其手。大清不幸生了他，更不幸的是生了他的皇后——慈禧。

咸丰即位之初，也有一番抱负。史书记载其“甫即位，即求贤才。”起用了林则徐、江忠源、李棠阶，罢免了穆彰阿、琦善等人。给政坛注入一支日益进取的清新剂。接着在他老师杜受田的授意下，下诏求言，征诸得失。摆出一种高姿态，表明其是愿意接受百官臣工的谏议的。或许是晚清的政坛急需重新洗牌，用人制度上的失察成了百官们第一个攻击的对象。大家不约而同指向了新任皇帝如何选人、用人上。时任大理寺卿的倭仁应诏陈言，指出“行政莫先于用人，用人莫先于君子、小人之辨。”咸丰读后，“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。”礼部侍郎曾国藩上《应诏陈言疏》，痛斥当时的“以畏葸为惧，以柔靡为恭”的官场作风，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：“京官办事通病有二，曰退缩，曰琐屑；外官办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颟顸。”最后说道：“今日所当讲者，惟在用人一端耳。”田雨公则上《振纲纪肃吏治》一疏。全文如下：

臣愚以为今日之要在振纪纲以肃吏治而已。吏治之勤惰责在直省督抚，而驭督抚以转移吏治则在圣天子。神明于赏罚黜陟之权，激扬而鼓励之，赏罚黜陟朝廷之纪纲也。今之督抚有四习焉：曰好谀、曰苟安、曰掩饰、曰取巧。今之督抚分治之政废弛者有五焉：曰仓军、曰漕运、曰盐法、曰兵制、曰河工。以趋走承顺为恭，以木强敦厚为迂，好谀之习也；以积重为难返，以责效为好名，苟安之习也；州县交代则授意弥缝，盗贼肆行则有意消弭，教匪失察则讳罪，剿捕失律则讳败掩饰之习也；智足以伺朝廷之喜怒，才足以欺一时之耳目，观其貌则恂恂焉，有似于忧勤，听其言则浑浑焉，莫窥其边际。事较易则预占地步而张大其词，事较难则坐观风气而迟回以俟，阅历愈久，趋避愈工，取巧之习也。四习不除五政不举。大省亏空正项钱粮至数百万，惟前任浙抚梁宝常以是获戾，其他督抚未闻有任其咎者。运弁帮丁水手需索州县，州县克剥花户，督抚总漕鲜能约束而禁革之。将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以致地方偶有剿捕，动辄糜饷老师。淮南纲运泉贩充斥，船户夹私以致额引滞销，正课悬岩，东南两河岁糜数百万金。名为修筑疏浚之用，自修防以来历有年所矣，岁岁修筑而不闻加高，岁岁疏浚而不闻加深，徒闻每年为工员请岁修，临时为工员估厢埽，侥幸无事，为工员多请议叙耳。诸督抚大吏身膺重寄，日讲整顿，迄无成效，皆缘因循积习以至于此。若治以渎职之罪亦复何辞，乃荷蒙圣恩，不加严谴，盖所以激发其天良，宽已往之咎，而责将来之效也。

伏考康熙三十九年副都御史励杜讷疏请督抚年终汇奏，若何察吏、若何安民、若何兴利除弊，或开注不实，治以欺罔之罪。所辖之藩司专司钱谷，臬司专掌刑名，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，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，则藩臬之优劣亦无遁情。圣祖下部议行，当时吏治最为近古，而督抚大吏如汤斌之素行清谨，赵申乔之清廉有性气，郭秀之办事和平，额积特之操守最优，皆明奉褒旨。他如李光地巡抚直隶，官吏兵民无不心服，命授吏部尚书，仍管巡抚事。张伯行为江苏巡抚，疏劾两江总督噶礼，大臣张鹏翮等定讞颇右，噶礼讞再上，圣祖终黜噶礼而原伯行。当时封疆大臣其才若守，盖无不在圣心之中，而有以真知而灼见之者，是以驱策群材，鼓舞一世，天下万世莫不颂圣祖黜陟之明，赏罚之常也。今诸臣当五政敝坏之际，荷蒙皇上宽其既往不即黜革之恩，固宜感激发愤力除积习以求所为整顿者。皇上综核名实高下，在诸臣之任劳任怨，实力整顿者几何人，其人之整顿者几何事，且整顿之事确有把握与否？著有成效与否？认真厘剔与否？掩饰取巧与否？皇上一一默识而熟察之，仍责令年终汇奏毋许欺罔，又察其所举之员与所劾之吏或当或否，又参以内廷大臣之密赞，部院台谏诸臣之公论，圣明洞鉴，喜怒不形，然后运赏罚黜陟之权，以振励纪纲，风示天下，公如衡鉴，迅若雷霆，信若四时，坚如金石，俾忠良任事之臣晓然于上意所响，必益争自濯磨，发愤修政；即有庸才陋质亦当战栗流汗，望风解绶，其敢营私骫法，干朝廷之典也乎？夫督抚大吏，文武将吏之纲领也，朝廷以黜陟赏罚驭督抚，督抚亦必以黜陟赏罚驭文武将吏；督抚任事则监司守令镇协参游莫敢不从事，督抚执法则监司守令镇协参游莫敢不畏法。四习既去，五政自举，纪纲既振，吏治自肃，臣以为今日之务，无急于此者。（《山西献征》）

咸丰皇帝看后“嘉纳焉”。

其实封建社会是君主集权制，都是外用儒术，内用黄老，兼及法家，实行的还是人治思想。田雨公上谏咸丰皇帝，要有齐威王烹阿封即墨的见识，要有康熙皇帝识忠辨奸的能力。这样督抚的好谏、苟安、掩饰、取巧便无处遁逃，四习尽除，督抚所任五政，自会有所振兴。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赏罚分明，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罚。

咸丰皇帝广纳百言的这种态度，让大臣们觉得如遇明君，可以输肝剖胆，直言敢谏。于是田雨公便针对咸丰亲政以来用人上出现的问题，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：奏为用人宜慎敬摅愚见仰乞圣裁事。

窃惟国家有治人后有治法。皇上御极以来黜陟严明，臣庶佩服。然臣窃见今日之用人所宜加慎者有三焉：□□□□以言，敷奏以功言乎？用人者必确见其有所建白，当所展布而后可委以重任也。外任之重，督抚而下莫若两司，然历余有年，熟悉民生之利弊者弗克称职。今皇上鼓舞人材不次擢用，前所授道员吕佺孙、知府孙毓桂未及到任均擢臬司，此在圣意高深为有真知灼见之处。然臣窃以为诸臣中有材堪造就者，宜优以督抚，其于所授之职确有成效，始加优擢。用之太骤，恐阅历未深，无以收驾轻就熟之效。且后来居上，其气易盈，任即迁，其事易废，使人知保举之可以超擢，则奔竞益多；使人知升转之无待考成，则勤功益

少，即或于召对时，喜其陈夸得宜。而天下事言之非艰，臣惟艰必待其行之，果副所言，始可以大任责之。若徒以言举人，窃恐巧饰成风遂至公然欺罔，此其宜慎其一也。官制内外相维非外重而内独轻，六部都察院综核庶务，即京堂三品以下各衙门典礼典刑所关亦巨，且京卿例得言事，必以品端识卓者任之，非为豢养衰庸地也。今外官来京有以京职留用者，果因其才堪内擢，自是调剂之方。或有声名平常经督抚及科道参奏者，验之不爽则当经予罢斥，若曲示宽容留京补用，窃恐黠者冀死灰之然，时巧言以行其荧惑，劣者为栈马之恋，将素餐而益纵诡随，安望其竭力办公整饬庶务，此其宜慎者二也。因才器使，用人之权。用当其才，小贤亦堪与任事；用非其才，大器亦难以建功。如新授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品醇学邃，刚正不阿，前蒙手诏褒嘉，士大夫无不弹冠相庆，以钦圣人纳谏之雅，所卜直臣大用之机。兹以帮办大臣远镇万里之外，外间口口疑虑，皇上安边绥远慎简臣僚，自有驾馭之权，非恒情所能测，惟是以学道之臣，出膺边寄，就使竭力供职，究恐用违其才。户部尚书孙瑞珍学优而才绌，以充翰林掌院、内廷授读，洵所优为，惟自迁任户部以来，办公竭蹶，物议纷落，当此财用支绌之时，泥其偏见，迄无裨益。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惟在圣天子知人善任，平日于臣工随事审察，明其优绌，有所擢用，务期人与缺宜，庶不致强以所短而掩其所长，此其宜慎者三也。臣极愚，黜陟之权非臣下所议，然幸逢天子虚衷延访，不敢不直据所见，以备采择。谨即臆因密陈，臣不胜悚惧之至。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）

这时，咸丰受不住了。这无疑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否定，颇为动气。因谕内阁：“田雨公奏陈用人宜慎三条，朕详加披览，其所言用人常经，尚不为未见。至倭仁以三品卿给予副都统职衔，作为叶尔羌帮办大臣边疆大臣要任，令其扬历谙练，并非投闲置散。而该少卿以为用违其才。若如所奏则外任皆为左迁，而新疆换班者，尤为摈弃。岂识国家文武兼资，内外并重之微意乎。孙瑞珍年近七旬，精力尚健，于户部事务本非素习。然数月以来，朕观其孜孜讲求，无时稍懈。该少卿称其办公竭蹶，物议纷滋。经军机大臣传旨询问，仅以传闻嘲诮之词回奏。朕亲政伊始，耳目未广。用人惟知公正，从不稍存成见。九卿科道拾遗补阙，朕所乐闻，然黜陟大权朕自持之。田雨公此奏殊属冒昧”。（《咸丰实录》）

又谕：“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奏，新授道员吕佺孙、知府孙毓桂未及到任，均擢臬司。用人太骤，恐阅历未深，无以收驾轻就熟之效。得旨：朕之破格恩施，乃振急之权。汝所言，乃用人之常经。所奏不为未见。然二人究有何不堪外任者，何不明言。又奏，外官有声名平常，经督抚科道参奏者。验之不爽，当经斥罢。若留京抵用，恐黠者冀死灰之然，劣者为栈豆之恋。批，此又何不明指其人？朕知之，汝所奏意必在万贡珍、严良训二人。然二人亦堪内用者。”（《咸丰实录》）

不过，咸丰最终还是表明了态度，“嗣后有言责诸臣仍当遇事直陈无隐，不得因有此旨遂缄默不言，负朕虚衷纳谏之本意也”。

时任候补道何桂珍又上封事，言倭仁“秉性忠贞，见理明决，生平言行不负所学，请任以艰巨”。